

莫言《红高粱家族》主题意蕴 及人物形象分析

——兼论高粱地里的民族精魂

◎于 姗 曹 爽

(空军航空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2)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文学创作早期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具有新时期文学转型意义的一部作品。莫言以其寻根的创作姿态、先锋的创作手法创造了一个浪漫传奇的“高粱地”世界,塑造了一批特立独行、大胆奔放的英雄人物形象,将生命与人性的力量展示得淋漓尽致。

在《红高粱家族》里,莫言以其变幻莫测的独特才情,大胆张狂的叙述笔调,饱蘸着人性色彩,绘出高密东北乡那个闪烁着原始粗犷人性的天空,以“高粱”与“酒”这两个意象为象征,诠释了自由奔放、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

一、高粱与酒滋养的民族精神

《红高粱家族》描绘的是抗战时期高密东北乡的一段农民抗争的历史,但值得注意的是它虽是一部反映战争的作品,但其创作的核心却远远不是战争,它与“十七年文学”或“文革文学”中描写战争的作品有着本质区别,任何试图从阶级或道德层面解读《红高粱家族》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是对作者创作意图与作品主题意蕴的误解。《红高粱家族》的灵魂与核心不是政治、阶级或伦理道德,而是人,是生命自身。解读这一点,还要从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两个意象“高粱”与“酒”说起。

走进《红高粱家族》的艺术世界,首先遇到的便是那无边无际、红成汪洋血海的红高粱,“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1]可以说高粱的形象无处不在,贯穿整部作品始终。那杀人越货的勾当、刻骨铭心的爱情、精忠报国的热情都发生在高粱地里。因此,我们绝不能把高粱只视为文本中漂亮的装饰物,或对其分析只停留在烘托气氛、营造意境等浅显的层面,如果这样,整个文本的人文内涵便会消失殆尽,作品的整个艺术世界便会崩塌。

红高粱这一形象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是作品的魂魄与生命,是解读作品的一把钥匙,没有红高粱这一形象,那么这一小说便与一般平庸的农民战争小说一样,除了更为血腥暴力外,无甚特色。但红高粱具体象征着什么?我们可以从文本中找到答案。如小说写道:“每一穗红高粱都是一个深红的成熟的面孔,所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一个伟大的思想。”^[2]在这里,高粱便是人,高粱的集体便是人的集

体,高粱的气质与精神便象征着民族精神。在这里,红高粱已成为一个个有生命有灵魂的活物,有着惊心动魄的智慧与力量,在作品中把一切人物、事件、环境都黏合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人与高粱已密不可分。尤其是奶奶死前那一大段类似幻觉的描写,更是让我们感受到红高粱深刻的底蕴与巨大的象征意义。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红高粱是人的象征,是生命与活力的象征。红高粱深植于黑土地,是中华民族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写照;红高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一个民族智慧的象征。此外,红高粱也象征着优秀而强悍的民族精神,是坚强不屈、敢爱敢恨、淳朴善良、豪放直爽的代名词。这一点,我们从全书结尾作者的论述可见一斑,这也是作者创作的动机与动力。尤其是作者对于杂种高粱的鄙夷与憎恨更是显出作者对于当代社会“红高粱精神”逐渐丧失与人的精神危机加重的担忧,对于在城市历经安逸生活后身上沾染的家兔气的强烈自省精神。作者自觉于当代社会的进步对于人类内在强悍民族精神的消磨与腐蚀作用,对人类社会属性空前强化,而生命意识逐渐减弱感到深深担忧,渴望通过“红高粱精神”唤醒被当代社会生活遮蔽已久的生命意识。

既然红高粱象征着不屈不挠、敢爱敢恨的生命意识与民族精神,酒的意象的出现便是激发这种精神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从古至今,酒一直与人类社会有着不解之缘,酒与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刻联系从来就是文学艺术诗意的眼睛。酒曾激发过多少仁人志士的壮志豪情,“三杯拔剑舞秋月,忽然高歌涕泗沱”是何等的感慨悲壮。^[3]人类自身不为人知甚至不为己知的善的意念、恶的种子都会为酒所激发而无限放大,无论结局的好坏,都自有一股豪情。酒促使人性的自然流露,因此,英雄往往需要一杯酒促使其建功立业,有情人往往需要一杯酒而摆脱社会桎梏。从这个角度讲,莫言热衷于写“酒”也就自有其深意。作者特别强调高密东北乡是最能喝酒的地方,那些敢打敢拼、敢爱敢恨的英雄个个都是大量。余占鳌每日喝得烂醉,戴凤莲在酒瓮里洗净满脸的血,甚至逼着豆官喝血酒。相比较而言,冷支队长在余占鳌与戴凤莲“一仰脖灌了”后却推脱“不胜酒力”,更显其懦弱猥琐。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高密东北乡人对待酒的态度也反映了他们的世界观。^[4]果然,余占鳌与戴凤莲完成了在墨水河边对日军的精彩而悲壮的伏

击,而冷支队长只能在激战后坐收渔利,更显其英雄品质的丧失,其平庸一面暴露无遗。但在这里,笔者并不是强调喝酒的具体行为对人们造成的某种影响,而是着意于酒作为一种文化对一个民族的整体性影响,高密东北乡就是这样一个浸透了酒文化的地方,我们可以称其为中华民族的“酒神精神”。

二、高粱与酒滋养的农民英雄

上文所述,红高粱的象征意义在整个作品中是一贯而终的,是小说的文眼与灵魂,但如果只有红高粱这一意象而没有众多的、鲜活的人物形象的塑造的话,所谓的“红高粱精神”便只能流于空泛与浅薄。伟大的精神需要丰富复杂的人物去承载,而《红高粱家族》就为我们塑造了一批好事干尽、坏事做绝、杀人越货、精忠报国、匪气十足而豪气冲天的“英雄加王八蛋”式的草莽农民形象。^[5]小说中的人物都闪耀着强烈的生命与人性光辉,其自身附着的原始生物性远远大于其社会性,而这也正是作者对其崇拜尊敬,并感慨于当代社会“种的退化”的原因。

小说中“我奶奶”戴凤莲是个抗日女英雄,也是一个敢生敢死、敢爱敢恨、极端叛逆、光彩照人的人物。她仇视不公正的婚姻,憎恨其父漠视女儿痛苦,为换来一头大黑骡子而扬扬得意的态度,在婚轿中因看见余占鳌坚实的肌肉、流畅的线条而怦然心动,更为余占鳌在高粱地里舍身相救而倾心不已,终于,面对余占鳌的劫持霸占,戴凤莲坦然面对。他们在高粱地里自由结合,一切的封建伦理道德都轰然倒塌,人性的光芒闪耀在那片高粱地里。

值得注意的是,莫言笔下追求个性解放与妇女自立的戴凤莲与五四时期作家笔下追求女性独立的知识女性有着本质的区别。五四新女性自觉于父权制社会与封建体制的不合理,纷纷要求独立与解放,这是对整个人类制度理性分析的结果,其身上闪耀着理性的光辉。而戴凤莲对包办婚姻的拒绝与对真爱的追求则是对自身生命本性的皈依,是对原始人性的一次遥远呼应,渗透着一股野性与蛮力,显出一种浪漫的理想化色彩,更有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力量。

如果说戴凤莲是以其对自由、幸福的本能追求去凸显红高粱精神的话,那么余占鳌这一人物形象的出现更显其复杂性。余占鳌一生中杀过很多人——胖和尚、单氏父子、花脖子,甚至自己手下濒临死亡的士兵,当然,还有不计其数的日本鬼子。但是余占鳌每次杀人的动机却不尽相同,余占鳌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反叛性固然是对“红高粱精神”的发扬,但其自身也被打上了封建伦理的烙印。如杀胖和尚,是因为其与自己的母亲有染;杀花脖子,是因为其摸了戴凤莲的乳房,这反映出余占鳌封建的“贞洁观”。又如当豆官鹌鹑蛋大小的卵子被狗咬掉时,余占鳌心痛不已,这其实是对传统儒家延续烟火思想的继承。而余占鳌之所以作为一个英雄而存在,是因为其强烈的自发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促使其完成墨水河边那场惊心动魄、名扬千古的战斗,促使其在日本骑兵面前痛下杀手。在《高粱殡》一章中,余

占鳌被冷支队长俘虏,而此时日军突然袭击,余占鳌及手下纷纷要求共同抗敌。面对冷支队队员的犹豫不定,余占鳌说出了那粗鄙不堪却惊世骇俗的一句话:“你们是中国鸡巴戳出来的就放了我们,是日本鸡巴戳出来的就打死我们。”^[6]话虽粗俗,却深刻反映出余占鳌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在面对外族侵略时,总是能追本溯源,从而看清大局,搁置本族矛盾共同御敌。正是这种意识才使20世纪中国纷乱的脚步得以统一,没有被外来侵略征服。余占鳌的这种民族意识也是“红高粱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余占鳌也不愧为高密东北乡的一株纯种红高粱。

除了戴凤莲、余占鳌外,《红高粱家族》中其他人物也都浸透了“红高粱精神”。罗汉大爷白天还被监工打得六神无主,像孩子一样地哭,而面对日军的剥皮凌割示众,却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这正是“红高粱精神”的闪现。二奶奶在自己的女儿面临死亡威胁时,竟脱光衣服,表现出“无私的比母狼还要凶恶的献身精神”。这同样是“红高粱精神”的喷薄。就连强奸了玲子的污秽不堪的余大牙,在面对枪毙惩罚时也表现得坦然无畏,令人肃然起敬。作者在文中评论道:“余大牙毕竟是我们高密东北乡的种子,他犯了大罪,死有余辜,但在临死前却表现了应有的英雄气概。”^[7]这同样是受了“红高粱精神”的支撑。

三、结 语

莫言带着生命与人性的文学观走入历史,以传奇的笔调重新描写战争,颠覆了传统的叙事手法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以“高粱”与“酒”为象征表现了中华民族自由奔放的文化品格与强悍不屈的生命形式。作者希望通过这种写作,呼唤生命力的复归,还现代人以精神元阳,体现出其对于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担忧与关怀。《红高粱家族》也因其特有的反叛性与高超的艺术水平奠定了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参考文献]

- [1][2][6][7]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 [3]林建法.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灵魂与灵魂的对话[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 [4]雷达.历史的灵魂和灵魂的历史:论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独创性[J].昆仑,1987(1).
- [5]张志忠.莫言论[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作者简介]

于珊(1978—),女,辽宁清原人,硕士,空军航空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军校人文素质教育及军事文化。

曹爽(1978—),女,辽宁沈阳人,硕士,空军航空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军校人文素质教育及军事文化。

[责任编辑 李佳怡]